

大家小集

胡适集

胡

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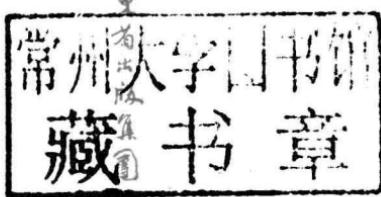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

大家小集

胡适集

胡适著 朱正编注

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胡适集 / 胡适著 ; 朱正编注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3. 4  
(大家小集)  
ISBN 978-7-5360-6676-2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②朱… III. ①胡适 (1891~1962) 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6328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丛书策划：肖建国 秦 颖

责任编辑：孙 虹 黎 萍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装帧设计：苏家杰 林露茜

---

书 名 胡适集

HU SHI JI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8.625 1 插页

字 数 402,000 字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8.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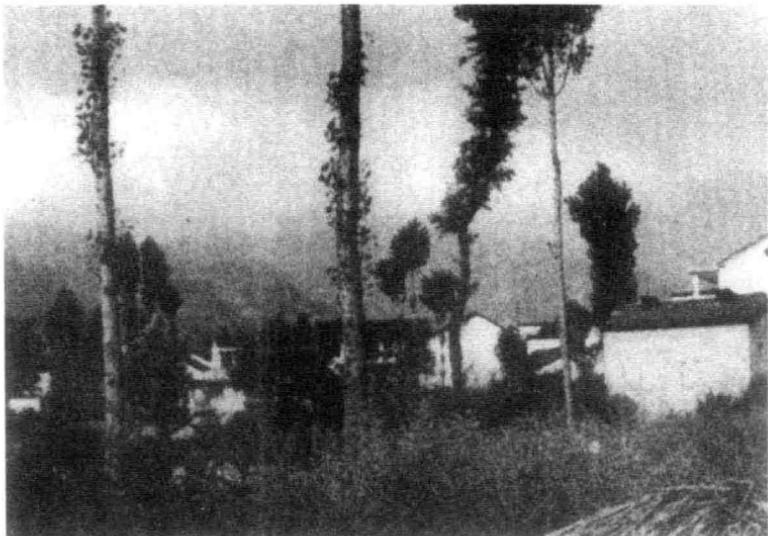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1960年9月胡适摄于台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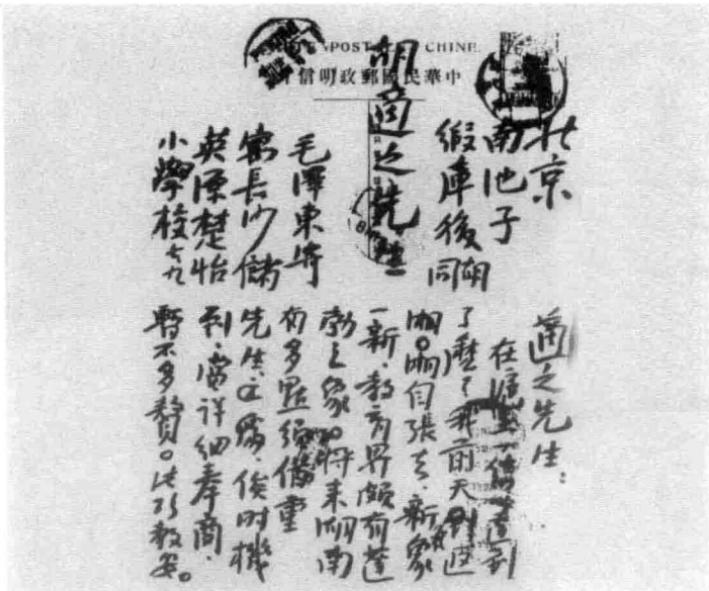
胡适的故乡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。



胡适夫妇合影。



1920年3月14日胡适（右二）  
李大钊（右一）、蔡元培（右三）  
人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。



1920年7月9日毛泽东给胡适的明信片。



北京大学沙滩校园全景，胡适在这里工作、生活了十八年。



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，胡适在北大任教时常在此处上课或演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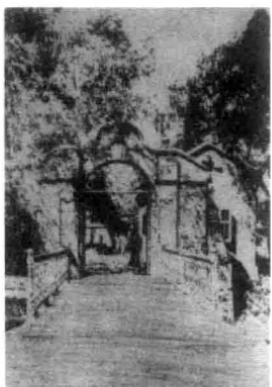
1927年12月，胡适在  
东亚同文书院演讲时与日  
本翻译铃木择郎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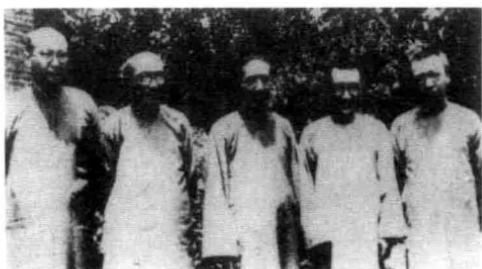
胡适1933年摄于北平，此时他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。



1930年1月《人权论集》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。



中国公学校门，1928年4月—1930年5月胡适曾任中国公学校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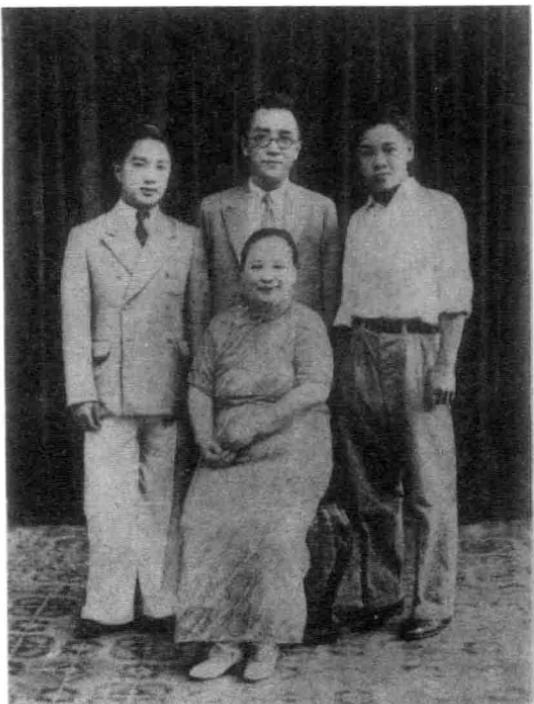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公学校长胡适（右二）与学校董事会成员丁穀音（右一）、蔡元培（右三）、马君武（左二）、高一涵（左一）合影。



1948年6月15日，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北大子民纪念堂的合影。前排：徐悲鸿(右五)、季羡林(左一)、朱光潜(左三)，二排：冯友兰(右三)、郑天挺(右四)，四排：邓广铭(左四)。

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  
疑。待人要在有疑處  
不疑。  
胡適

胡适给人写的一幅题词。



Hs Tsu-Wang      Mr. Hsich      Mrs. Hsich      Hu Ssu-Du  
(Named after Su-Du - Dewey)  
To Dr. John Dewey  
With greetings of the Hu family.

胡适将这帧“全家福”题赠给他的老师杜威博士。



青年时代的江冬秀。



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。



胡适的美国女友韦莲司。

不是怕風吹雨打  
不是羨矯且看重  
只喜歡那折花的人  
高興和伊親近  
花瓣兒給了落丁  
勞伊親手收存  
寄與伊心上的人  
當一封沒有字的書信  
西五年作藏花詩直之

三



胡适写此诗时正与曹诚英热恋。

青年时代的曹诚英。



胡适任驻美大使时，与他的老师杜威在一起。



1938年胡适初任驻美大使时所摄及自题诗句。



胡适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，在场的有罗斯福夫人(胡适右一)、著名作家赛珍珠(胡适右二)、李承晚(后排右四)等。



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解释中美友好万人签名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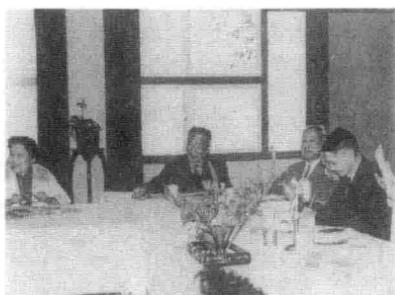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这两句王荆公的诗为胡适所喜读，此时他的神态颇显示出这样的自信。

寧鳴而死  
不默而生  
胡適  
道一  
新華試筆  
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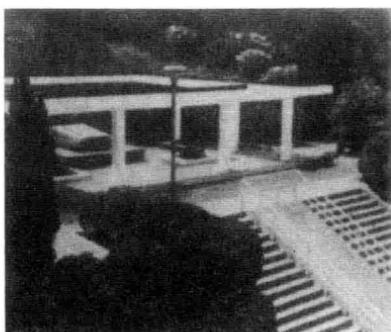
胡适晚年喜欢的两句政治格言。



1959年11月，胡适参加《自由中国》社十周年纪念会时与雷震合影，当天胡适即做了《自由与容忍》的演讲。



1962年2月24日，胡适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，这是他最后的留影。



台北市南港的胡适墓园。

大家小集

胡适集



1960年胡适摄于台中故宫博物院。

## 编者的话

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、思想、学术、教育等诸多领域中，胡适都是名列前茅的大家。《大家小集》给他编一本集子是完全应该的。可是他又真正的著作等身，只看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部并不完全的《胡适全集》，就有四十四大卷之多！即使仅仅选录其中最最重要的作品，也将大大超过《大家小集》的容量。所以，这部书要怎样来编，还真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。再三斟酌之后，最后编成了这样的一本。为什么这样来编呢？我想，首先要向读者说明的是，真要读胡适，真要对胡适多少有一点了解（还不说作一点研究了），就得去读他的全集以及他所主编的几种期刊，至少，得去读收文较多的他的选集或者文集。只读这一本《大家小集》是远远不够的。《大家小集·胡适集》的任务，只是让读者对胡适有一个最初步的了解，来引起读者读胡适的兴趣。

基于这样一种考虑，本书首先是向读者介绍胡适其人，这就是选录他的自述性质的文字：《四十自述》、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、《南游杂忆》这些，而不去选录那些文学、史学、哲学方面的重要论著。像《文学改良刍议》这样开风气之先的文献，几乎所有胡适选集都要选录的文章，本书就没有选入。

入选的《四十自述》，是他的一部没有写完的著作。他原来的计划是“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个阶段，留学以前为一段，留学的七年（1910—1917）为一段，归国以后（1917—1931）为一段”。他只写成第一段的六章就没有写下去了。仅仅这六章，也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佳作。从这里，读者可以看到胡适青少年时代的生活，以及安徽、上海等地的社会环境。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中的《逼上梁山》一篇，是他根据留学时期的日记写成的，写的是“文学革命运动的原起”，他自己也宣称这是《四十自述》的一章。

《南游杂忆》细细写出了一次旅行的经过，也是自传的性质。它不但有助于了解作者生平事迹，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。当时中国号称是一个统一国家，其实是地方割据势力在那里自行其是。像广东的陈济棠，他就对胡适说：“读经是我主张的，祀孔是我主张的，拜关、岳也是我主张的。”而广西的白崇禧说的是：“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，我们要礼孔，还得造个新孔庙！”在这篇《杂忆》里，读者可以看到当时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等许多方面的具体情况，是极有价值的史料。

胡适的《治学方法》是他 1952 年在台湾大学的三场讲演。他拿自己治学的经验来谈治学的方法，谈到了他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对《醒世姻缘传》的研究，对《水经注》的研究，谈到他想写禅宗史，因为材料不够写不下去了，到巴黎和伦敦寻找和发现神会材料的经过，等等，是可以把它看作他的一篇学术自传的。他说，他“为什么花多年的工夫来考证《红楼梦》《醒世姻缘》呢？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，就是：我在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

法。我所有的小说考证，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，用偷关漏税的方法，来讲述做学问的方法的。譬如讲《红楼梦》，至少我对于研究《红楼梦》问题，我对它的态度的严谨，自己批评的严格，方法的自觉，同我考据研究《水经注》是一样的”。说到他对《水经注》的研究，他在这上面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写了那么多的文章（在四十四卷《全集》里就占了四卷！）。在这篇讲演里，他对这一项工作的原委作了简要的说明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发了疯，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《水经注》这个问题呢？我得声明，我不是研究《水经注》本身。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《水经注》的案子。”简单些说，就是重审一百多年来许多学者断言戴震的《水经注》的工作是偷了全祖望和赵一清两个人的《水经注》一案。他终于查明：这是“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”。本书没有选录关于《水经注》疑案的考证文字，看了这篇讲演的相关部分，也就可见一斑了。

胡适说过：“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。”他在各个时期都写了不少的时评和政论。他早期最重要的政治论文是1919年的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！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篇文章就是“我的政论的导言”。本书把这一篇作为他的一篇代表作收入了。胡适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，后来他在《我的自述》一文中说了：“直到1919年6月中，独秀被捕，我接办《每周评论》，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。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，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。然而国内的‘新’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，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。我看不过了，忍不住了，——因为我是实验主义的信徒。——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。我在《每周评论》第31号里提出，叫做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

谈些主义》。当时（民国八年）承‘五四’‘六三’之后，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。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，故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的警告。”这篇文章去今已经九十多年了，这个警告依然值得重视。事实已经证明，它所批评的那种“‘目的热’而‘方法盲’，迷信抽象名词，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”的态度，是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具体问题的。

胡适在1930年出版的《人权论集》一书也收入本书中了。这本书辑印了胡适、梁实秋、罗隆基三人发表在《新月》月刊上的关于拥护人权的几篇文章，其中除了胡适写的六篇之外，还有梁实秋一篇、罗隆基三篇。为了保持原书的完整性，他们的这几篇也就不抽出去了。再说，这些文章内容也是互相补充的，更不应该抽去。书中，胡适在《〈人权与约法〉的讨论》一文中，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和“先知”孙中山，批评了他在《建国大纲》中关于“训政时期”、“宪政时期”的这种提法。文章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，提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“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，遂被拘禁了多少天”的事。总之，这本书是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，要求改善人权状况的。它对国民党奉为神圣的孙中山和最高领导人蒋介石，对他们的理论、政策以及现实的治绩，都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。执政的国民党仇视这些文章，竭力封杀，没收焚毁，甚至还出书反驳，可以说是意料中的事。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之前，还在《新月》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，就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了。胡适1930年2月1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道密令的内容：“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《新月》第二卷第六、七期，载有胡适作之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及罗隆基

作之《告压迫言论自由者》二文，诋毁本党，肆行反动，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，若有发现，即行设法没收焚毁。”这些文章结集为《人权论集》出版的时候，胡适在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周栎园《书影》里的一个典故：“昔有鸚武飞集陀山。山中大火，鸚武遥见，入水濡羽，飞而洒之。天神言：‘尔虽有志意，何足云也？’对曰：‘尝侨居是山，不忍见耳。’”这个典故很好地说明了这书作者的心情。面对着国民党政权这个强大的存在，眼看着他们肆意践踏人权，无法无天，一个知识分子想要改变这局面，想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国家，深深感到自己的无力。自己能够做的，不过是写一点这样的文章，出一点这样的书罢了。至于这能不能使现状有一点改变，是不是能够推动一下民主化、法治化的进程，也不敢存多大的希望。只如鸚鹉救山火一样，尽一点自己的心而已。序言说：“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，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，实在不忍袖手旁观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，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，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公民的道义的担当。这些年来人权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。我国政府发布人权问题的白皮书就有好几次了，足见我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。现在看看八十多年前人们有关的议论和思考，大约是不无意义的事情吧。

我们这个选本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胡适全集》为工作底本。选文范围限于这部《全集》所有的文章。只是我们作了一点校勘，对工作底本错漏之处作了改正。例如《〈朱子语类〉的历史》一篇中，有一段引《宋史》四二一包恢本传的文字，安徽教育版《胡适全集》是这样的：“庆